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三五期 ——
(二〇一二年二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202b)

- 【不堪回首】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宋彬彬
【各抒己见】 什么是“永不变质”的“质”？——一点评李慎明《文化大革命
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沈敏特
【口述历史】 几度风雨几度秋（下） 李冬民·阎阳生·米鹤都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不堪回首】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 宋彬彬 •

文革爆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说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传说不等于事实；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和他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不说就不说了。近几年，为了搞清楚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天，在我们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站了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记述或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反思，渐渐复原出当年的真实面貌。作为当事人的我也问自己：在那些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难的校友们的伤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我相信，这已不是四十年前。

一、关于两宗“罪行”

综合各种文章和传说的内容，我的“罪行”大体归结为两宗：一是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的杀人比赛，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二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简称“女

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下简称“实验中学”）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我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联期间就开始在各地传播并广泛流传、形成文字见之于多种书刊杂志，比如某著名学者在其《自撰年谱》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原北京十一学校的一位老师撰文指出，他若干年前所写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个人的学生，并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虽然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200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持类似说法。我觉得不能再回避了，从此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回忆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2003年春，我给刘进打电话说起这个想法。之后，我开始找同学了解当年情况，帮助自己回忆。2006年，我和一些同学集中走访了不少老师、校友，后来还开过几次座谈会。在我们班（女附中66届高三3班）两次班级座谈会上，十几位同学敞开心扉，从文革前的教育、切身的感受一直谈到文革初期学校发生的几件大事，她们具体、生动的叙述唤起我不少记忆。还有校友找出了文革时期的笔记或给我写了文字材料，有的校友和我一起做了多次的交流，帮助我回忆、梳理、分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基本理清了自己文革前的思想状况和文革开始后头三四个月的经历。

二、文革前后

1960至1966的中学六年，我都是在女附中度过的。上初中时大家都很单纯，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直到初中毕业我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1963年我升入高中后，学校阶级斗争教育开始明显加强。虽说有“讲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阶级路线，但团内还是做了在发展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要重点培养干部子弟。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我高一入了团。入团后，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比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学接近。那时我每天给刘进补习俄语，因为她一贯反对同学中的骄娇二气，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锻炼和劳动时特能吃苦，还敢于在课堂上提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像她那样自觉锻炼。那时，我们班组织过不少活动，像从学校步行去爬鹫峰，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请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讲革命故事，等等。我们每天学毛选，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批判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雷锋的很多话成了我们的口头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还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里同学的思想也很活跃，大家常在政治课上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不清楚就问老师，但课任老师经常回答不了，于是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梅老师教我们班的政治课。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断，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时我们高三年级已经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可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觉得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党，学校16名学生党员组成了学生党支部。当我们得知，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学生党支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对我校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还和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梅老师展开讨论或辩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一早，高三的学生党员刘进、马德秀来学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原来提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我想，这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意见在支部也讨论过，因此当即表示同意。我们连草稿都没有打，三人边说边由刘进写在旧报纸上。她签名后，我和马德秀也签了名。现在我已记不清楚大字报的标题和具体的措辞了，只记得是对学校不让我们高三学生参加运动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近年，有几个同学回忆起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开头的一句话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大字报贴出后，学生们议论纷纷，迟迟不回教室上课，有不少人也开始写大字报声援。学校一下子乱成这样，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有老师批评我们这样做是“反党”，校党总支的老师也害怕我们滑向右派学生。当天下午他们在一间大阶梯教室里帮助我们，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贴大字报就是反党。6月3日晚，团中央的几个干部来到学校，他们说我们贴大字报做得对，做得好，坚决支持！还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听到他们的肯定，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6月4日，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上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北京市委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八条意见，（1）强调要把全校师生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有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不要搞过激行为，让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把学校的运动深入下去。听到这些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觉得有党派来的工作组，学校乱的局面就可以扭转过来了。工作组进校后，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体忙的是些什么多已记不清。经过这几年的调查了解，忆起了一些，特别难得的是一位同学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记，据此我整理出以下记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教师代表会只有两名老师，由他们负责组织老师的学习和写大字报。不久，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生都在本班教室按布置的计划来学习毛选和党报社论、写大字报，下午在校园看大字报。

6月17日，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立即分为保、反两派，聚在宿舍楼前展开大辩论。当时，我们学代会的同学都不同意她们这种作法，认为工作组是党派来的，运动也在有序深入，对工作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来，为什么非要贴大字报呢？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会上，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卞校长是假党员，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随后，校外人员袁某带着儿子和母亲在工作组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哭喊着冲到台上控诉卞校长有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边哭诉边揪打卞校长，会场一下子就失控了。几个原来站在台上拿木枪的高年级同学开始用木枪捅打卞校长，还不断有学生、老师跑到台上喊口号质问、推打，卞校长当时就吐了。揭发出卞校长的这些问题让师生感到惊讶、气愤，但是出现打人的混乱局面，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央八条，即便是出于义愤也是不应该的。6月27日，出现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一次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6月底，工作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位校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全校师生集中对卞、胡等校领导的所谓罪行“梳辫子”、深批深挖。工作组除了具体安排运动进程外，还提出了“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批判”的口号，学生按班级每天半天学习、半天揭批。一位同学当时的笔记记录了6月底传达了李雪峰、胡克实的报告，布置的讨论题有“放手发动群众和加强领导的关系”、“文

斗和武斗哪一个水平高”等等。

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带着刘进和我到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运动情况，卓琳也在场。当时主要是工作组汇报，邓插话或集中讲几点。很多原话我已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听到袁某带人冲会场时，邓当即说这是个坏人。邓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尽快恢复党团组织正常工作；一定要制止在校园出现红卫兵组织；恢复团组织的办法就是把学习好、思想好、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学生吸引到团组织周围，让闹事的没有领头人。还说要和反工作组的同学辩论清楚这些问题，缺席辩论也可以；说运动每发展一步都要排队分清左中右；还说哪里有那么多种修正主义，一个学校顶多一两个，要抓紧解放大部分的干部和教师。当天下午，张世栋在全校讲话，号召开展“要不要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辩论，辩论进行了三个半天。那几天满校园贴的都是批驳反工作组同学的大字报，有些同学还被追着打骂，一些人回到家里还有家长找谈话。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还被安排到郊区农村劳动。我参加了集训。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集训开始不久，传来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消息。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那几天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还说革命就是要“运”，要“动”，要靠自己。虽然我知道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8月1日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当时有不少干部子弟为对联叫好，认为是长了“红五类”的志气；但也有说这样刨个三代四代，咱们“红五类”也要变成混蛋的；更多的同学因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力而沉默。在辩论对联时，我觉得它不符合党的“重在表现”政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对这种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说它客观上起到推进运动的作用，而且矫枉必须过正。在对联问题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没有公开质疑。

工作组在校期间，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已游离于校外，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工作组撤离后，“红旗”的骨干学生回到学校。据初三和高三几位同学回忆，原来“红旗”的骨干学生于7月31日在食堂布告栏贴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的大字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们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不说话了，我们让围观

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8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李老师把签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和看到这种场面，我很害怕，也很紧张，卞校长问题还没有定性就被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刘进说应该赶快向市委汇报，于是我们和一些还在医院的同学连夜走到北京饭店去找市委领导，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接见了我们。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刘进和我都记得他说的大意是：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

走回学校后，大家心里很乱，几个人坐了一夜。我们刚跟着工作组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参加运动，学校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虽然上级讲话了，但“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该怎么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该怎么理解？我们又该怎么办？但无论如何，应该尽快将卞校长死亡的消息和吴德讲话传达给全校师生。刘进是原学代会主席，她说就由她来说吧。第二天早上，刘进通过广播向全校宣布卞仲耘死亡的消息，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还说以后不许打人了。

在那些天里，我们在一起议论最多的是再这样乱下去不行了。8月8日，刘进、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商量怎么办，有同学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想以筹委会这种有组织的形式继续革命、参与运动。于是，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

通过2003年以来的调查和回忆，女附中的红卫兵应该是筹委会成立之后出现的。那时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北京城区各中学。说出现，是因为女附中的红卫兵没有贴大字报宣布成立，也没有章程和组织机构，很松散，所谓家庭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认为自己是红卫兵的，那就是了。红卫兵和筹委会由同一批人负责，我也是负责人之一。8月18日前两天，我们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后，各班都开始做准备，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为了能戴着袖章参加集会。

8月18日那天，是由刘进带队去的，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

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的文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当时我曾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她问什么意思？我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当天回到学校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几个同学来找刘进和我，其中有一个是反工作组的骨干。这个同学对我给主席献袖章很气愤，她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还说这样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纠正。我们觉得她说的对。原来我们是想自己解放自己，继续参与运动，没有想到这种作法是延续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再担任筹委会的职务了。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此刻，我多少感到了斗争形势的复杂，之后还有不少记者想来采访，我一概谢绝。外校红卫兵有事来找我，我也回避了。有学生来学校设法找到我，看到我后很失望，说“要武”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对“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我感到不解，我们班曾抄了几个同学的家，我没去，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暴力活动。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

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从武汉回来后，班里同学见到我，说你这个不懂政治的人怎么卷到政治里去了？从此，我远离运动成了逍遥派，连对学校的运动都不闻不问，更没有去参加“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尽管如此，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言一直没有断过。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大会上骂了我父亲，说宋任穷的鬼女儿去武汉保了湖北省委如何如何。4月我和妈妈被押到沈阳软禁起来，与外界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1969年初春，我从沈阳逃出来到内蒙牧区找同学插队，人还没到，谣言就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老乡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们把自己口粮、衣物匀给我，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样走。插队时我一直埋头劳动，得到牧民的理解肯定。1972年春，在牧民老乡和大队公社领导的推荐下，我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又因谣传被退掉。老乡和知青都去反映情况，最后是负责锡盟招生的金老师顶住压力想办法录取了我，让我走进长春地质学院的校门，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幸运地开始求学生活。此后，我不提过去，不提家庭背景，只想远离喧嚣，认真学习和工作，平静地和家人生活，与同事和朋友相处。

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届高中）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将8月5日校长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门上给毛带袖章联系起来，作为因果关系来论证。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导致校长之死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她举出的唯一证据是前面说到的那个为抢救卞校长而给医院作担保的7人名单，她说：“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名单第一个名字是李松文老师，我的名字写在最后。

多年以来，该校友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导，认为是宋彬彬带领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见，毛给我改名“宋要武”，同时我的父亲还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些中外学者也将这一讲法写入文章或专著中，以讹传讹，还被不少人添枝加叶，以耸人听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0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性学研讨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国女学者Emily Honic 研究卞仲耘之死的文章，她根据那位校友的说法，把我和“八五事件”联系在一起，并把我给毛袖章与我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联系在一起。有美国朋友说，这样的说法太吸引西方

人的眼球了。他们认为，社会上的谣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写进学术著作性质就不一样了，影响恶劣。他们建议我表明态度，说清情况，必要时诉诸法律。后来，我的一位美国朋友与 Honic 及出版社进行了沟通。他们了解真相后向我公开道歉，并承诺如该书再版会予以更正。（2）

在此之前，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卡玛也曾动员我接受她的采访，起初被我谢绝了。后来发生了这件事，大家都劝我不要再沉默，他们认为在一个严肃的场合说明事实真相，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表现。这样，我才在纪录片杀青之际接受了卡玛的采访，并从 2003 年开始调查回忆自己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为什么不露面？因为我不想在美国成为公众人物而再次卷入舆论的漩涡，更不愿单位同事和家人的平静生活因我而受到干扰。

三、我为什么参选“荣誉校友”

2007 年，实验中学要举办 90 周年校庆并评选 90 名知名校友（正式名称为“荣誉校友”）。有同学推荐了我，并通过了学校的初选。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后来，在一些同学、朋友的劝说下，我接受了他们的看法：这是为自己澄清的机会。这期间，我也犹豫过，也曾想退出，怕接受提名给母校带来负面影响。可同学们告诉我，已进入了评选程序，如退出就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而且，我退出也会给学校和推荐人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样，我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中参加了“荣誉校友”的评选。我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和大气系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博士，这是我被推选的理由。

同年 3 月，我们班准备制作一张名为《六十回眸》的光盘作为校庆礼物，也是为我们自己共祝花甲。关于光盘的图文，班里形成共识，不提 8·18，不用我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因为我接受了“知名校友”的评选，所以班里把这个原则也反映给校庆办公室和校领导。我按班里的要求，把自己离校后的照片选了一遍，选照片时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写下一些抒发感情、说明背景的话，以供做光盘时参考。这些材料我在 4 月底发给了做具体工作的同学，没有想到这封私人邮件会上传到学校“荣誉校友”评选的网络上。7 月 23 日，我在母校网站上发现后非常惊讶。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我的“个人简介”里还有 8·18 我给毛戴袖章的内容。我马上找到刘进，请她和学校联系，要求校庆办公室将关于我的图文全部从网上拿下来。虽然刘进和我多次催促，但直到校庆活动结束后仍未见改变。

在校庆活动当天，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竖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现场，后又陈列在校园里。《90 年辉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90 年图志》的第三章也用了这张照片。

我当选为荣誉校友一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实验中学的校庆也由此成了为文革翻案、替红卫兵张目的活动。网上流传着不少声讨我的文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我与卞校长之死有直接关系。读了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是为文革中的死难者感到伤痛；二是为谣言难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我想说清真相，但说什么都会被误解。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明智之举。

四、我的反思和道歉

40 多年过去了，我曾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参与写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答案是，

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作为女附中的一名学生，我永远忘不了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这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也是我和许多同学心中无法解开的结。我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正当盛年的卞校长因受尽自己学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长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长的儿女失去了母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长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领导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尧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2006年清明期间，几位同学去看望了王先生，向卞校长的遗像献花以表达我们40年来的思念、哀悼与歉意。我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

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当时，工作组因为犯了压制群众革命的错误而被撤走，党报社论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此，绝大多数同学想的也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8月5日，学生发起游斗所谓“黑帮”，出现了暴力局面，导致卞校长不幸去世。“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校领导被施暴时，虽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一些无力的劝阻虽暂时缓解了事态，但根本无法制止新一轮的殴打折磨。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对上述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我将以对母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

写于2007年12月，2012年1月改定

注释：

（1）八条要求：（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摘自郑洸《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中国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文库，2005年内部出版，第219页。

（2）美国女学者 Emily Honig 及出版社的道歉信见《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

□ 原载《记忆》第八十期

~~~~~

【各抒己见】

什么是“永不变质”的“质”？

——点评李慎明《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 沈敏特 •

◇ “李文”可称“开山之作”

李慎明先生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的《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题目太长，之后发表在其他媒体时改成《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还是不短，所以本文简称为“李文”。

“李文”的中心题旨很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虽有缺点或以失败告终，甚至造成“浩劫”，但初衷是为了党和政府“永不变质”，这是一个伟大的、至今以及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而所谓变质的具体内涵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似曾相识燕归来。对于姚文元的文章，和文革前后大大小小的写作组的文章尚有记忆的人，对“李文”绝不陌生，其中的观点、论据、阐述方式、文章风格，我们曾经无数次地领略过了。但对当代的很多年青人，则可能非常陌生，还有新鲜感。因此，再来讨论，绝非过时。而更重要的是，我尽管无法同意“李文”的基本理念，但对此时此刻能发表这样的文章，仍然认为意义重大，理应欢迎。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当代史绕不过去的课题。可以这么说：搞不懂文革，就搞不懂中国。但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的建立却首先在国外；它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国，文革研究属于“禁区”，很长一个时期是媒体不可触摸的领域。我国可以公诸于世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严重滞后了。我希望“李文”成为突破这个“禁区”的“开山之作”。

#### ◇ 用“文革理念”看文革，看不懂文革

“李文”对文革的研究，悖离了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因而，“永不变质”的“质”的具体内容，首先不靠谱。于是引出了一连串的不靠谱。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延续，必须有一个现代政治理念的基本框架的参照和视角。

一是文化大革命与现行政治制度的关系。毛泽东不管有多大能耐，离开了既定的、能被她使用的制度是寸步难行的。就说“四人帮”，把“四人帮”派到美国去，能搞一场文化大革命吗？绝对不能。这才是现代政治要寻找的答案。

一是毛泽东和宪法的关系。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宪法的，通过宪法时，他也是举了手的。但，他怎样对待宪法？他为什么能为所欲为地这样对待宪法？领袖人物和宪法的关系如何，这才是现代政治要寻找的答案。

一是毛泽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怎样“服务”呢？人民对毛泽东有约束力吗？除了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对他紧跟再紧跟，还能说他一丁点儿的缺点或不足吗？人民群众有没有质疑、批评和约束政治领袖的权利，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

一是如何在实践中判断毛泽东的执政行为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是两个：一是实践，二是利益。离开了这两个关键，回避实践对人民利益或正或负的影响，就不可能在现代政治层面上，估价一个政治人物和他的执政行为。因此，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它的高峰——文化大革命对人民利益（包括人民的生死存亡），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回避，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这是现代政治必须回答的问题。

“李文”远离这四个方面所构成的现代政治理念的基本框架，而着重于毛泽东的“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初衷”，从中引出所谓“伟大战略思想”的判断，并强调了它的现实意义。这样的论述，如若大家能保持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式的政治思维惯性，定能毫不迟疑地全盘照收。但，今非昔比，有所长进的中国人就难以喝彩了。

◇ “变质”的“质”，不是主观设想，而是历史规定

穷根究底，“永不变质”的“质”什么？按毛泽东当时认定的“质”是社会主义，“变质”是变成了资本主义，而“变”特指是“复辟”。

这里面恰有一个历史的规定性。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格局。当时的共识是不能消灭资产阶级，要给资本主义一个有节制发展阶段；没有这个阶段就没有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的准备；因此，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个部分。解放战争所以进行得如此迅猛，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有所实现，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了他们在新社会的地位，相信可以为中国的富强贡献一份力量。这一时期，决定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归来的民族资本家，不乏其人。建国之初，历经战乱而诞生的新中国，经济恢复得如此之快，也与这两个原因密切相关。

应该说，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高层，都不曾料到，这个阶段是如此之短，好像刚上开锣戏，就落幕了。180度的大转弯，资本主义成了消灭的对象，资产阶级成了专政的对象，“三大改造”被说成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

我们常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此举与马克思主义相悖。马克思的名言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第4页）

所以，违背规律必受惩罚；我们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怪象。

“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虚幻的恐惧。复辟的本意是推倒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还原一个旧的政治制度。中国虽然有民族资产阶级，但从未执掌过政权，也没有形成过资本主义社会。孙中山当总统勉强强算是代表资产阶级，但没有几天就让给了袁世凯，根本没有构成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也没有建成资本主义社会。袁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军阀；他一上台就是另搞宪法，把宪法变成独裁者的护身符。袁世凯倒台，换来的是军阀割据；蒋介石的“统一中国”，则是新军阀替代旧军阀，实行的是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民族资产阶级生存都成了问题，何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在世界上，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的标本是英、美、法、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果真有本事，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复辟”出一个类似英、美、法、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来吗？

开个玩笑，若真有这个本事，如今的权贵子女、富豪子女，何须千里迢迢，削尖了脑袋钻到发达国家去改国籍、拿绿卡了，留在中国不就得其所哉，获得了资本主义的享受。

◇ 中国有社会倒退的危机，却绝无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

反“复辟”究竟反了什么，树了什么？

中国缺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力量，却又要大规模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必然的结果是扩大打击面，制造冤假错案。世界上最穷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讲了几句不属于“歌功颂德”的真话；世界上最穷的农民，仅仅因为卖了几个舍不得吃的鸡蛋和屋前屋后种的几许蔬菜，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样的被专政的“资产阶级”究竟有多少人难以计算，说五六千万却绝对是保守的统计，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史无前例”，也无庸置疑。

为了强化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一个奇特的解释，即说“百家”实际上就是“两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就忽略和掩盖了在中国大地最强大的一家——封建专制主义。于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就出现了一个贻害无穷的现象，即把先进的思想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加以批判和扬弃，而把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大力传扬。

资深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先生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及他十几岁参加新四军时的政治气氛，那时很流行、很得人心，使大家愿意献身去争取的目标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家毫不怀疑未来的新中国一定能兑现这样的目标。之后，也有人批判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的“欠缺”，民主的“虚伪”，但立足点是确信新中国一定会有充足的自由，会有真实的民主，绝对不会把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全部送给资产阶级。是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批判过这些概念，相反，努力追求这些目标能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中得以更全面更充分的实现。“个性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就是马克思的语言。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提升和优化，而绝不是抛弃，更不是对立。抛弃和对立，恰是社会倒退的标志。

在这些政治运动（包括文革）中，大家习以为常的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口号、价值和行为方式。最表浅的就是以《东方红》为代表的个人崇拜。在“万岁万岁”“万寿无疆”响彻云霄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位革命家胡志明，他坚决反对越南人向他呼喊“万岁”。理由很明确很简单：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封建皇帝。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学生在天安门举出“小平，你好！”的横幅，如此震撼人心的原因——它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

这当然还是表浅的体现，更深层次的是，从一系列政治运动向文革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全党全国的政治指挥权愈来愈集中的过程，而终于在文革中推出了一个新词：最高指示。与此相关的政治行为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能引起我们联想的只能是四个字：联即天下。在这里，宪法是不算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被代之以绝对权威的“运动群众”。每当发布“最高指示”，哪怕是更深半夜，也要爬起来去游行“庆祝”，表示拥护，表示坚决执行；谁敢公开说个“不”字，那就是“反革命”，而且是“现行”的。

这就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理念。

这就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制度。

这就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行为。

以这种理念、制度和行为作为前提的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只能是社会大倒退的浩劫。

◇ 是程度“估计”过头与不足，还是对历史的错判？

如何解释浩劫产生的原因，“李文”以倒果为因的手法，为毛泽东作了可笑的开脱。“李文”认为原因是：一是对阶级斗争的估计过于严重，二是对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恶果又严重估计不足。

毛病出在“估计”上吗？

上面我已指出，中国还处于需要资本主义存在和有所发展的历史阶段，它还不是消灭的对象；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压根儿没有复辟的前提和力量。所以，问题的根本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因的论述，把子虚乌有的“资本主义复辟”当作现实的革命对象。焉能不乱！

而所谓“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是“估计不足”的问题吗？一场以个人指令作为“总指挥”的政治运动，取代了宪法，取代了人大和政府，取代了一切法律程序，这本身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空前发展，是无政府主义的总根，显然，大无政府主义是管不住小政府主义的；压根不是什么“估计”足与不足的问题。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

真正“变”了的是什么？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离开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一种真正的“变质”，即从马克思主义变质为非马克思主义。

这是观念的倒退，而且也是影响社会面貌的政治行为的倒退。一种不符合国情民意的政治目标，是不可能通过民主的程序来推进的。目标决定手段，这是规律。一场文化大革命是在大多数人民，包括高层人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状态中发动和推进的，它所需要的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一是领袖的权威，二是多数人的盲从。于是，个人崇拜、独裁专权，发展到了极致。这里当然有两项重要的历史资源：一是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所取得的初步成效而由此赢得的民心；二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本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赢得的民心，进一步延续五四的科学民主的启蒙，但是我们却用来推进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插曲。我的一个学生曾经对我说，我们应该高举五星红旗，消灭资产阶级。我说，高举五星红旗，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这五颗星中，有一颗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从三大改造，到反右斗争，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再到文化大革命，与此相匹配的就是失落科学、民主，失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限膨胀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召唤封建专制主义阴魂的过程。

什么是真正的“变质”？违背马克思主义精髓，是变质的基本原因。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至今为止的最成功的典范。为什么小岗村的改革是改革开放开端的标志，为什么我们又有了民营企业家，实行多元的所有制，为什么我们把改革开放的深化定位为“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一体”的改革，这恰是新民主主义的延续，是对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校正。当然，我们不要求简单重复新民主主义，毕竟时代有所不同，面对着不尽相同的历史条件；不再称为新民主主义，而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无不可。但，新民主主义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需要延续的。

“变质”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绝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变质”为英、美、德、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而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回潮。今天我们已经面对的权贵资本主义，绝不是原旨的资本主义；它的产生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它的经济、政治的发展方向，和原旨的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它依托的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而是具有垄断功能的权力把持，因此，民主、宪政绝不能给它带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它需要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政治天地。最近有人公然声称，“不要迷信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就是这样的准确无误的信息。迷信与科学的认知是对立的，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迷信。但在改革开放必须深化、人民对改革开放寄以最大期望的今天，把“迷信”的帽子戴在改革开放的头上，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是封建专制主义回潮的赤裸裸的、低级的表演，而更深层的重新包装的不同程度的回潮，必是层出不穷，远不会绝迹。

本文啰啰嗦嗦几千字，实际上只说了一个字：质。

□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口述历史】

几度风雨几度秋（下）

• 李冬民口述 • 阎阳生、米鹤都采写、编辑 •

（续 z k l 2 0 1 d）

◇ 江青大骂造反派

当时上面插到北京市中学的有两条线：一个是张根成，代表中央文革戚本禹；一个是刘丰，代表卫戍区李钟奇。我们对戚本禹负责，戚本禹对江青负责。戚主管中学工作，中学里三教九流的这些事，他都知道。我们接触很随便，什么意见都可以谈。我觉得他什么都明白，又装糊涂，痞拉吧唧的一个人。北京的中学生们老踩乎（编者注：北京话，看不起的意思）他，特别是老红卫兵和后来称之为联动分子的这些人，动不动就说戚本禹是17级的“大干部”（意思级别太低）。也许他也有些自卑感？

他个子挺高的，穿着军装，带副眼镜。我总觉得他还有点浅麻子，长的不怎么好看。在中央文革的这些人里头，他是唯一一个不像个成年人，也不像个革命干部的人，有点嘻嘻哈哈的，经常发出坏笑。

有一次，有个同学给我带了块表，大家都看，那时候中学生没有带表的。戚本禹就凑上来逗，你这是不是抄家抄来的啊？让人感觉很贫，有点痞子似的那个劲儿。

在中学红卫兵的派系上，戚本禹对“四三”的人很欣赏。组织中学红代会时，“四三”的几个干将都是他推荐进入红代会的，只是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戚本禹就觉得“四.三派”的这些情报部啊，作战部啊，非常积极，非常能干。他认为我呢，很迟钝，中学红代会因循守旧，没有削尖脑袋四处钻。戚本禹批评我：你看好多活动，包括“七·二〇事件”，王力和谢富治从武汉回来，他们坐着军用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大家都去迎接了。你们“四.四派”就不如“四.三派”敏感，消息也不灵通。

那时候，左右分得很清楚，“四.四派”就是一个中庸派。“揪刘（少奇）火线”，我们很晚才去，而且是为了凑份子，但是人家“四三派”早就摆了摊，都在中南海附近，抢位子似的。

可是不久，毛主席批判“王关戚”：什么冲击军队啦，“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长城！一夜之间就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给弄倒了。主席做了批示以后，江青大发雷霆。有一个晚上，江青就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头都叫到人大大会堂，轮番训斥了一回。

其实在各个大学里，这种反军和揪军内一小撮呢，实际上都是中央文革的人支持的。在北京就是从支持“四三派”、批评军训的解放军开始；在外地就是江青支持河南“二七公社”的文攻武卫，武装造反派开始。以后，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大规模武斗，局面不可收拾。主席批评以后，江青就翻脸了。在人大大会堂召开的这次会上，她对这些学生领袖大发雷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他们几个人都挨了骂。

在中学生里的，就把我点了名，饶上一顿。这又是因为陈伯达给我造谣，说我是小官僚。中央文革对我真是没的可骂，因为从一开始，我一直欢迎解放军在学校搞军训，维持秩序，开展复课闹革命。当时陆海空三军都派人到中学来了。军队干部来了以后，遭遇过大学的极左派，中学“四·三派”的反对。而我支持军训、支持军队，是有口皆碑的，当时也有一定影响，他们都知道。

江青点到聂元梓时，说反军就是她挑动鼓动的，说她企图夺权，夺谢富治的权。轮到蒯大富，因为老蒯是极左的，部队里都说他很狂妄。江青讲，这些冲击军队的，都是蒯大富派去的人，是他指使到全国去煽风点火的。然后江青很气愤的说，我都不愿意说他了。意思是讨厌得都不愿意说他了。

然后点到韩爱晶，说得很严厉：你自称是小韩信，你鬼主意特别多，说了很多阳奉阴违的话。但说韩爱晶的时候，还说了些爱惜的话：我这么批评你们，这么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爱护你们。三娘教子，古时候有这个三娘教子，我现在就是教子。

她接着说谭厚兰极左，说主席、中央一再不让你们冲击军队，这些冲击军队的责任，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了。说王大宾也是那样。我们坐在下面，她挨着个把这几个人都说了一下，而且不容他们发言。

会上陈伯达、康生也都讲了，但主要是江青讲。我觉得她是埋怨性的，是嫁祸于人的批评。反军的事，她难道没有责任？当时，江青有一个很低级的讲话就是“文攻武卫”。这首先应该是中央文革负责任。

这次会是在1967年的秋天。在我的印象里，这样长时间的听她讲话，应该是最后一次。

◇ 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有一次在人大大会堂开座谈会时，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春天。江青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表扬山西省的刘格平。说这个同志受多少年迫害，他的水平很高，他老早就提出反对干部的特殊化。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像巴黎公社那样建立新的革命原则。然后说这种机构，以后都是作为工人农民，革命群众的代表。这应该经常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东西。这时大家就谈到了红卫兵的前途。

红卫兵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我们曾经想过，一次开学生座谈会，我给刘龙江提过：就是让红卫兵啊，把青少年给组织起来。而且认为它不能光是一个地方的组织，应该有全国性的组织，要起到过去共青团的作用。当年我们确实探讨过前途吧，说要改造红卫兵代替共青团这个事情，虽然一提而过，但我一直念念不忘。

当时有一个政治难题，在中国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这事是不能提的，即使在文革那种混乱之中也不可能。因为党中央，包括中央文革，态度非常明确。

有这么两件具体的事。1966年底，我们开始到处夺权。我们在这儿占地方，在那儿占地方，占了东四致公党总部，我又最早在那办了报。等规模大了的时候，我们就想占更大的报社，曾经一度 and 大学红卫兵“二司”一起，把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社给占了。那儿的职工对我们还非常欢迎，他们印刷工人组织的造反派，为了表示自己跟一般工厂不一样，也按学生味儿的叫红卫兵。

大学红代会有个北航的学生，叫红兵，他跟韩爱晶比较熟。我们把《中国青年报》占了以后，红兵说：这样吧，咱们就把这个《中国青年报》，建成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办成一个全国红卫兵通讯社。以后还可以叫世界红卫兵通讯社。

红兵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我就听他的。他写了个书面的东西，在一次座谈会上交给中央文革的人看，我记得江青当时就提出反对，不同意。她说：你们建立这种全国性的机构，要毛主席批准才行。江青是个说话爱激动，有时候会自作主张、下一些决断的人。但是在这件事上，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原则：全国性的机构、全国性的组织，一定要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结果我们虽然接管了中国青年报，但没有敢成立全国通讯社。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哈尔滨的造反派成立了一个“荣复军”，是由荣誉军人、残废军人、复转军人组成的。他们搞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荣复军”，马上就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取缔了。那时候我正在东北串联，看到到处张贴着布告，就是在全国性地通缉反革命组织“荣复军”。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也有人给我传播点中国的政治知识：就是共产党绝对不会批准你成立全国性的机构。

当然你名称就叫世界红卫兵也可以，还真有人叫过这名字，但是你不能有实际上的组织。那时候虽然不知道这些规矩具体是什么，但多少有那么点政治常识。所以那时候我们只叫首都兵团，再没敢狂妄的叫什么中国的、全国的，还是叫对了。不过在中国，从没人正式讲过这些禁忌，共产党自己也不光明正大地说。表面上它也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实际它没有给大家这种结社权。

◇ 发配部队农场

1968年夏天，北京很乱。各大学武斗，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大学，五大学生领袖都放下了。但中学情况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整个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人考虑这些。虽然我大小是个官，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能有什么作用。

在此之前，我的同学曲折他们一些人自发地去上山下乡。曲折要求去农村呢，是他文革前的想法，一种个人的理想主义。为此，曲折付了很多心血，他们找了市革委会的老赵，文教组的赵唯理，先找的新疆，最后决定到内蒙，纯粹自发组织的。没有人给他出钱，也没有人给他宣传，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他们走之前，到天安门宣誓的时候，当时也聚了一些人，应该有几万人，规模挺大。

曲折他们走的时候是1967年的秋天。他们在北京销了户口，带着户口走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大点的孩子也都懂，可以说这是要有很大魄力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事，红代会也不知道，市革委会文教组其实也是不了解情况。曲折他们这种对下乡的探索，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宣传，是瞎猫撞死耗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呢，从中央高层讲，全国千百万人的就业，肯定是个社会问题了。谁来解决？我估计是干实事的，只能是周总理了。他利用曲折他们这个事，开始宣传，慢慢形成了气候。后来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下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同时，城里大批臭老九，下乡跟这个思潮也有关系。我觉得，老毛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工农相结合。周总理做这个事，可能经济因素考虑的多，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啊。他们俩出发点不一样。

红代会在成立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清谈馆，应该说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到了1968

年的8月份，就开始轰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的中学红代会，好像曾经讨论过上山下乡，但当时的核心组没有谁主张和支持上山下乡，至少没有明确的意见。上山下乡始终没有在中学红代会成为议题。但对斗批改的教育改革的事，我很支持，也做过这种安排。当时在我们东城区教育局的小院，还设了个中学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是我们学校的侯子贞和女二中一个学生许惠琴。

我没有考虑过去农村。因为我从农村来的，从记事的时候就在农村。我文革前就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的还是科学和技术，而咱们对科技太忽视了，没有在这上面下力气。我觉得上山下乡跟自己的革命理想不一样。另外，自己的出路，我也在考虑。我觉得，大学还是应该办的。为这个，我还跟市革委会的负责人丁国钰直接争论过。他是老滑头，他支持“四·三派”，把我们当敌人看。怎么左，他怎么搞。他只跟上面，不了解下情，也不会同情下边学生有什么问题。丁国钰当时捂着我的嘴，不让我说。我是高一就要考大学的人，文革那几年，动不动就到清华北大，但还是和大学无缘。

1968年春天我看上大学没什么希望了，要当兵去。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就提出来：你先不能走。在别人呢，不算工作。在你呢，有个中学的工作，还没有完，你现在不能走。当时我眼睁睁看着二炮和武汉空军要人，可惜都没有走成。

到了下半年，陈伯达一见着我就说，你怎么还没走啊？我于是向谢富治提出：我要走了，不让我当兵，那我去种地去。陈伯达明确告诉我说，你去农村你就会拉山头。我说我一个人去，他说一个人去也不行。最后，他就把我弄到一个部队农场种地去了，说是执行“五·七指示”。那时候北京大批的人马还没有走。我一个人下到65军一个生产点上，既不像当兵的，又不是插队的，孤零零一个人在那生产基地待着。我当兵和我的任职免职等，都是谢富治办的，但这些手续呢，都没进到我个人档案里。弄得现在我要退休了，连工龄都说不清楚。这是后话。

到了1968年的10月，北京举行“十一”庆典。北京市革委会就把我叫回来了。刚回来，就让红代会的人安排我去机场接哪个外宾。在机场，我穿着部队给的一身军装，见到了周总理。总理看见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是红代会通知，十一参加这个活动。总理说：你完了就赶紧回去，既然下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最后一面见总理，他就是这么说的。

◇ 落差和思想动荡

我1973年就离开了部队农场，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日子实在没意思。回北京有一段时间没工作。我的兴趣在科学研究，原来还是想搞中学时候喜欢的物理研究，看了一些资料，特别向往搞生物物理，研究植物的光合作用，是比较前沿的学科。我自己定的目标是进科学院，但是那些单位都不招人。我父母都是老干部。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被下边机关的人批斗，直到1971年才解放安排工作。所以他对我有很多顾虑，担心我在文革当中的身份，怕我惹事，觉得我少接触人、少说话为好。所以他也没兴趣帮我找人，认为我还是去工厂好。

北京市那时候还有三支两军办公室，管部队复员转业的那些人呢，就是卫戍区的几个处长。文革当中，我跟部队的关系很好。他们见我回来也很关心，帮我找工作。当时最好的工作呢，待遇高点的，就是银行，特别是海关。他们都给我联系了，让我看待遇，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不进国家机关、专政机关，其他地方你想挑什么挑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过去讲的军警宪特这些强制机构，他们在整人、在管理国家。我干什么都成，但不能进专政机关，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把我们排斥在外，这让我特别反感。他们全是好意，也是对我特殊照顾，但是事实在这摆着。

我父亲过去在市委工业部基建处工作，跟一些大企业的厂长们一块搞过基建什么的，比较熟，他就把我弄到第二通用机器厂，后来叫北京重型机械厂。这是个上万人的工厂，当时也算比较现代化了。我分在修理车间，叫热修工段。工厂有高炉、平炉，我们就负责维修这些。我到这以后，我父母就觉得放心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工厂在西郊，要经常进城不太容易。我要是晚上下班后进城活动的话就回不去了，要是我老回家他们就发觉了。不回家呢，那你就很困难，因为就要赶末班车往回走。骑自行车跑，要四十多分钟，也很辛苦。

我在1973年，就是这么一种不甘心的状态。进工厂有两方面的不甘心，一方面，就是我希望从事青少年时期爱好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居然没有成功。那时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实际上在共产党体制下，连给自己安排一个安乐的或者对自己有利的人生基本生活条件都不懂。我的父母那时候也是局长，权利也很大。我父亲那个轻工业局在北京市有十几个公司，有五六百个工厂，有十五万工人。从解放初我父亲一进北京，他就管工艺美术这些行业。这个行业现在看来都是宝贝，如象牙雕刻、玉器、钻石金银器、景泰蓝、雕漆等，而且对一些老艺人都有特殊政策。比方他们做字画交易或者珠宝交易的时候，都是先批几万块钱的货带走，允许他们在饭店里去交易，然后才交钱。那时我家在东单市委宿舍，那屋子经常满满的人。他们送的东西不计其数，但是都拒收或上交了。一直到九十年代，我父亲家的床，都还是铺板，就是一个木板下边两条板凳架着，那个板凳上和铺板上还都钉一个小铁条，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房管处财产，还是租的。他们整个生活就这种状况，对生活享乐不懂也不讲究。我想找一个能搞研究能看书呆着的地方，这么一个愿望也没达到。

另一方面，就是感到这个国家对我们的不认同。心理上不服气也不平衡，当然还是对文革。我觉得我们做得都没有错，而且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原来那些熟人啊，像吴德、丁国钰啊这些高官，四人帮在政治上搞的很左了，他们仍然是一口一个正确。包括我父亲这样一些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这些人上来以后整体上对年轻人有怨气，但又不是冲着发动文革的人，不给他们提意见，而是对着年轻人来，冲着我们来。就是在家，我也觉得这些人很不对劲，那些过去挺左的人毫不羞耻地就变身，把脸一抹就成一贯正确的了。好像他们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从来没举过毛主席语录本，没做过那些极左的事一样。他们不是很客观地平心静气地来承认，哪些地方对的，哪些地方错的。那时，你如果承认毛主席路线对的话，那你应该至少对群众不能否定。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群众起来都是乌合之众，但是群众让你见识到一些东西，而且反映出一些真实的问题。你们自己的工作作风，至少是不很切合实际的。我觉得从这些大的变动上，看出这老一代很不诚实，而且我觉得他们报复心理很强。

◇ 《论新思潮》

有件事让我更不平静了。那时候，我接触了一些被整成五一六分子的重要人物。当初，北京市革委会里的常委中，大学有那五大领袖，这些人当时是知识分子，但是不务实。工人里有一些，农民里还有几个，中学生里就我一个。但是到1974年，北京市革委会的四大支柱里的三个，工人、农民、学生的代表人物，个别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没挨整，上述这些群众代表都被批斗被整治。除了我之外，几乎无一漏网。我跟总理接触过，周总理很喜欢我，用我办事。老毛据说当时也喜欢我，当时传闻老毛在1967年说，青年学生里有三个比较好的群众领袖，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一个是他的湖南老乡，北师大的谭厚兰；再一个就是中学生李冬民，他提到这么几个人。我认为道理上应该能讲通，但是这种传闻的渠道背景都不太清楚。吴德和丁国钰实在也找不出我有什么毛病，而且我对部队的三支两军、恢复秩序，都是很支持的。所以他们还想利用我，据说要在二通用给我安排一个万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但是我看吴德那些人，他们有些事做得还是不对。我从1967年以后基本上不跟风了，因为中央文革做事太违背常理，太脱离实际了，自己说话也矛盾。而吴德那些人还在跟风，特别是“五一六”的事，大批工人被弄得家破人亡，自杀的非常多。现在说起来，至少在政治艺术上也不应

该这么做，中央文革这些人呢，我觉得很不理解他们。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北京的这些事都是谁干的？一个是谢富治，谢富治死了，剩下吴德变成第一书记了，事情都是他们干的。这“五一六”后来弄不下去了，而且这事明摆着是个错，在别的地方只要领导换了，就开始纠正了。可北京市的头儿还是吴德，他干的事，他就不认错。我这时候认为这个应该纠正，就犯傻，仗义执言地就这事开始提了意见。我们几个朋友和工人一起，三次到市革委会门口贴了大字报，主要是批评北京市抓“五一六”扩大化等问题。当时的口号是批林批孔，责任还是推到林彪的头上。

这就在政治上就形成了对这个体制上的矛盾，我也跟这些人谈过，跟吴德、跟吴忠、丁国钰都谈过。我说，对这些人的问题，你没事实就应当纠正，有些人的职务你也可以不恢复，有些能力不行的你也可以不用，但是不能在政治事实上给人家弄个乌七八糟，不清不白的。我说的合情合理，这是可以做的事。但他们不讲道理，吴德在会上还攻击我，说了我很多坏话。你当领导的说话不能这么不负责任，这把我说怒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公开化，贴了大字报。现在看来，我也不后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他们政治上很不光明。

我的思想呢，这时开始对文革的极左行为有了一种系统的认识，就是至少可以在文字上能系统描述，这就是“论新思潮”。1975年初，我写了一个几千字的《论新思潮的出现》的论文提纲，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翻来覆去，不三不四”，“实际上失败”了。中央文革等“纯粹的文革派，已成了新贵族”，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巴不得他们早日垮台”。新思潮其实是对极左路线的一种批判，从政治上、经济上、工业上、科技上等。我写了不止一篇，还有一些。我写的这个《论新思潮的出现》，现在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这个东西后来被他们抄走了，结果就成他们的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当时很多认识都是正确的。当然，我们那时的“第三势力”和美国安东尼·吉登斯说的“第三道路”还不相同，我们实际上阐述的是一种赶超发展经济，全就业、全保障理想状态下的新兴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我在这个提纲里就提到了。包括工农业生产的步骤方针，对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大学生的否定态度，包括对样板戏等等。当时我们的这些东西，包括我写的，虽然有那时候的语言，甚至有点不合乎共产党的口径，但今天看大多都站得住。

这期间，实际上交流的有一些人，但是没成立什么组织，因为我知道共产党最害怕别人成立组织。我们真没有什么组织，但是我们亲爱的党不放心，我估计把我列成危险的另类，主要是怀疑我们有组织。我们那时候比较经常交流的，工人是一类，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他们是一类。他们看了些书，比较早地在民主思想上提出了口号，这是共产党所不容的口号。实际上呢，就按共产党所讲的民主体制来讲，毛和中央文革也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也至少应该恢复一个集体领导啊。这种说法也就基本说明我们的态度。我的一篇文章提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是在文革当中利用群众运动的声势，在政治上形成了极左的路线。按照当时文革当中的“法律”，就是攻击罪了。

◇ 盯梢、眼线加设局

当时市革委会一些人要给我定罪，不过他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首先，他们对我采取了专政的特殊手段，那时候还没有安全局，就让公安局成立了专门的小组，两个处长带着，使用了外线、邮检等手段。他们用各种交通工具，自行车、摩托车、还有那时候刚进口的日本轿车，就为了我这么一个人，白天夜里值班。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整天跟踪。我后来就感觉不对劲啊，怎么上班、下班、回家、找朋友，总有人跟着呀。

197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了王府井。大约到了王府井大街南口，我就突然转身把那便衣揪住，然后当众揭露，搞得他们非常狼狈。但是没用，他们还是白天黑夜的跟着我，

我去找朋友，他们就在楼下守着。我就体会到电影里描写的那些地下工作者和狗腿子特务了。后来我也就习惯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局还用了一个“眼线”，是一个曾经在《工人日报》做过事的一个编辑邹X。这个人给吴德还是给谁写了份自荐信，自荐当特务打入我们内部打探消息。因为要给我定罪需要过硬的证据。那个特务，他不仅打探消息，还有意设局。他把我和首钢的工人张兆庆，同时骗到他家去。然后他鼓动张和我交流“思想”，企图借此引出我的反动言论。公安局长刘传新交代：“要想办法让张兆庆、李冬民见面，……只要李同意了张的话，就是反革命，就能抓李。最好能一网打尽。”张兆庆那次没有带文字的东西，但是他谈了他的一些观点认识。张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本人是1958年前后当兵的。他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他那时候就谈到，对老毛，他基本上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文革，老毛从1957年反右，1959年对彭德怀，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是错的。他当时重点是谈毛泽东，但还提到华国锋搞的是一个右派的军事政变。他谈得很系统。他这个观点我还接受不了，因为我没有那些经历。我当时觉得反右还是对的，因为有人要夺共产党的权，老毛不干，把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文革当中这些事我很清楚，所以我说，你对毛全盘否定，这个我不接受，我们是共产党的崽子。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过犹不及，过了就是错的，不够也是错的。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对他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我是这么说的，这是我当时对毛的真实看法。他们做的这个局当时没有得逞。

◇ 平反四五，呼吁小平出山

我们到1976年总理去世，大家都觉得一种希望的破灭，也对四人帮他们搞的东西有种怨恨的情绪。打倒四人帮让大家稍微松口气，大家吃螃蟹，三公一母。大家敲锣打鼓欢迎一通。当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红军书法家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大概是10月7、8号，她拉着我去香山公园，在公园里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觉得眼睛一亮，这是条件反射，我又高兴又担忧。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是华国锋，明明知道他水平不行，还说“放心”，其实这是他最后最不放心的。另外，从道德和私人感情上讲，朋友托付你的事，你完了把人家老婆抓起来，怎么也是不妥的。反对错误路线的功劳让华国锋夺了，但他思想上恰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对老毛还来了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之后到我们出事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去向。对这个事怎么看，一个是对华抓四人帮的事大家是高兴，但是仍然存在着好多问题呢，希望能够完全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华国锋能解决下边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如果不解决的话，从我们的心理来说也是有阴影的。为此，我当时找过许多人交流，一些文革中打过交道和没打过交道的，找过一些工人，找过一些有想法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影响的人。后来看，华国锋还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的和四人帮的极左的东西，也没想到他对老干部居然还是那么个态度。

老华呢，思想上抵触民主这套，就是共产党内的开明政治也没做好。而且在技术上，他不搞民意调查，不搞社会调查，你不看看老百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马上下发一个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不许对老毛说三道四。我们在1977年初的时候，包括伊林涤西啊，又开始议论，共产党体制没变啊，该当反革命的继续当反革命，然后老华接着抓新的反革命。那时候大字报还没取消，在北京长安街上，很多人写了很精彩的批四人帮的东西，也点到了现在应该有些改变的东西，再往后到西单民主墙的时候，从理论上更有力地对共产党现有体制进行了批判。

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我们想应当把群众的要求反应出来。群众要求一个是反四人帮，要把四人帮极左的东西，他们称为路线的东西纠正过来；另一个要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最主要是天

安门事件应当马上平反。我们商量的三个口号，第一条是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立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一个焦点。第二条呢，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是体现民意。第三条呢，惩办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原来想说吴德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刽子手，最后缩小目标，缩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刘传新。后来我看到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上，有这一条标语的照片，就在现在东方广场的那个台阶下边。参与这件事的主要成员有我；重型机械厂的赵尔明；有电报大楼的李永萍；有张立才；刘握中；再一个是钟家伦，他在部队的时候曾议论四人帮，被抓起来打成反革命；还有郑小龙，他现在搞电影的。我们是在钟家伦提供的景山后面总政的一个楼里商量决定的，具体日期是应该在1月5号左右。写大标语是在六部口电报大楼后面李永萍的宿舍里，主要是张立才执笔写的。钟家伦找的人弄车拉浆糊，在总理逝世一周年前一天的1月7号，6贴出来了。那一条欢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大标语贴在新华门对面，然后另外是王府井到东单，现在的东方广场下边。

◇ 拍案惊奇的假案

吴德当时没动我们，人家怎么商量的不清楚，到了2月份，他们先把我父亲支开到大庆，让他带了一个考察团去大庆学习。好像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我在工厂上班，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说，有事开个会，把我从工段叫到车间。我到车间没多久，一帮便衣和一个穿藏蓝制服的警察就进来了，呼的一下都拥到我身前。他们说：李冬民，你被逮捕了。我问，为什么？那人说，别问，跟我们走。2月25号，把我送到半步桥监狱。同时在北京市一共抓了大概六、七个人，我们厂抓了三个，有我、赵尔明、王健。在去监狱的路上，在城里抓了李永萍。还有程潜的小女儿程昱，那年大概还不到十八岁，是我的干姐妹，她跟我们议论过这件事，也把她也抓了。还有刘龙江、秦喜昌也被抓了。这几个其实跟我们刷标语的活动一点干系没有。然后是刘握中、张立才，他们俩没进监狱，在单位被专政了。钟家伦和郑小龙可能都是在单位审问、监管，但没有逮捕。还有同仁医院的护士王玲。还有些是跟这些人有关系的被牵扯的二三十人，北京市是这样。

然后外地抓了三个，在内蒙古跟我们有来往的两个人，李明启、唐志洁，跟我们议论这个事，被当地公安局抓起来了。青海的王如山，原来是北航的，也被抓了。其余还有谁，我不知道了。这些人家里都被抄了，拍了许多照片，据说是给吴德、吴忠这两个人看。据他们自己讲，搞这次行动，出动的警察、干部和街道的积极分子七百多人。这些人抓了我们、拍了照片以后呢，大功告成，然后在颐和园听鹂馆搞了个庆功会。这当中，那个特务立了功。他不仅报告了许多后来成为我们罪证的东西，而且说，我们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反动。

这个案子把首钢那个工人张兆庆放在第一个。吴德说，要让他担纲，但重要的是抓李冬民，因为他影响大、联系人多。接着，吴德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华国锋。三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讲话，就利用我们这个案子，来给全国定大调调。一个是天安门事件不予平反，二是不让老邓出来工作，然后一个是两个凡是，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坚决反对，凡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照办。这两个凡是是从我们这儿提出，跟后边的那些说法实际一点关系都没有。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查明，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一个张兆庆，一个李冬民。他们要抬邓小平，排斥华国锋，叫抬邓排华，分裂中央，要抢出在押的王洪文，另立伪中央。这是一个巨大的反革命阴谋。这样，他们就借此把全国的方向给定了，并规定不许随便去天安门写大标语。这是华国锋搞的一个事，为维护他的基础，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假案，压制邓小平，也遏制了全国人民要把极左路线纠正过来的愿望。

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老邓出来工作，我觉得这是华国锋要抓我们的根源。直接原因则是吴德和北京遍布的四人帮残渣余孽，他们多年来执行这些错误的东西，包括像“五一六”，以及工业、农业上的问题，自己怕承担责任。于是欲盖弥彰，就这样把我们上报给了中央。后

来抓这个案子的一个市委书记，在文革当中曾积极支持极左派，和我们这些人一直是对头。我曾经说过中国工人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还远远比不上波兰的独立工会，都差很多等等。这个话呢，也让吴德用上了，说我攻击中国工人阶级，另一个就是说我提倡工人与党对立。他们把张兆庆和我捏到一块，再把张兆庆和王洪文捏到一块，说我们要武装营救王洪文。这个编造过程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和张兆庆见面的时候，我说的是对毛主席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仅凭这点要定我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很难。但批判我时，他们很极端，说我们要打倒毛主席。在我写的文章上用的是“毛主席”这三个字，不是称为“毛泽东”，其实称他为毛主席就还没有要彻底批判他的意思。他们要给我定罪，又从这里面找文章。可是文章里“毛主席”三个字前面并没有“打倒”两字。一个姓陈的具体办案人员，是原来市革委研究室的，他就请示管我们这个案子的负责人贾X。那个人就跟这些具体办案人员交待，前面缺“打倒”两个字，你们就模仿李冬民的笔迹，给他填上。只要符合李冬民的反革命思想就可以作为证据，搁到案卷中。那时候，他们已经有复印机了，好处理了，他们就拼到一块。他们就是这么办的案子，所以这个案子后来叫李冬民假案。贴上去那两个字就组成了“打倒毛主席”的字句。北京市委做了大量的印影本，批四人帮用的是大本，批我们有两个小本。我们的反革命集团案当时传达到群众，家喻户晓。

当时华国锋为稳定局势，全国下令处决了四十六个政治犯，最著名的就是史云峰，一个吉林工人。听说也有人提议要枪毙我，也许因为这案子做得太假，他们还是有点心虚，没有成真。后来，中央全会开会，把华国锋、吴德等人拿下的时候，也是用李冬民假案来做的炮弹。当时有人主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来教育全党全国。主管宣传的领导人说，这个事情就别登报了吧，有些事情如公安部门用眼线、模仿笔记造假等太黑暗了，不宜公开，就在内部说说吧。我想，使用眼线啊，设局啊，造假啊，这种公安的特殊手段，让共产党的脸会没处搁了。给我平反、消除影响下发的文件，共产党才发到全国的省军级传达。所以这个案子共产党做得不伦不类，直到今天还没有真实报道过。

注释：

- 1 即六年制的小学。
- 2 编者注：据刘龙江回忆，中央文革指定五个人作为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小组。其中，李冬民为组长，还有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的刘刚，101中学的任公伟，还有一个姓杨的老师。”参见刘龙江：“我信奉中庸之道”，《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
- 3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现在的社科院前身。
- 4 据王宇和侯瑛回忆，当天通知他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市中学红代会组织部长秦喜昌。
- 5 保密电话。
- 6 编者注：据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的口述回忆，商议写标语的时间应为1月7日夜，贴出时间应为1月8日。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